

民國時期的「五四」紀念活動

• 楊 濤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標誌性事件，其影響力經久不衰。在1920至1939年間，從政府到民間，特別是各大院校學生，幾乎每年都會舉行各種紀念活動。這些紀念活動以1928年為分水嶺，前期為北洋政府統治時期，後期為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五四」的相關紀念活動也從民間轉為官方，從非正式轉為正式，並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

一 早期的五四紀念活動

1920年的紀念活動是五四運動之後的首次。當時許多名流紛紛發表文章，對於青年在五四當中的重要地位給予高度評價。梁啟超發表〈五四紀念日感言〉，稱「去年五月四日，為國史上最有價值之一紀念日」^①。五四時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也撰寫論文，稱「自去年五四運動以後，一般青年學生抱着一種空前的奮鬥精神，犧牲他們的可寶貴的光陰，忍受多少的痛苦」^②。對於廣大青年學生，黃炎培則擔心他們「這樣單純潔白的腦筋，如何受得住這種惡濁社會所蒸發的甜酸苦辣的滋味」^③。

這一年全國各地相繼舉行了紀念活動。在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北京大學的紀念會上，男女學生參加者達萬餘人，他們原定遊行，但因軍警干涉，不得不取消^④。為了避免與北洋政府發生正面衝突，北大學子可謂用心良苦，他們經過一輪又一輪的磋商，議定在校內（不在校外），自由集合，不排隊不持旗，校門也沒有貼「五四紀念會」字樣之紙條，盡可能減少官廳注意^⑤。北大紀念會開始前，每人先發了一面黃白藍三色旗，旗上赤書「五四」或「五四紀念」字樣。時任北大紀念會主席的魯士毅在報告開會宗旨時指出：「此旗非國旗之缺二色者，而是以三色代表自由平等博愛三義，中赤書五四，表明以五四之赤心，爭回此三者之

1920至1939年間，從政府到民間，特別是各大院校學生，幾乎每年都會舉行五四紀念活動。以1928年為分水嶺，前期為北洋政府統治時期，後期為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五四的相關紀念活動也從民間轉為官方。

意。」^⑥用這樣醒目的旗幟和這樣深邃的含義來表達對於五四的紀念，可謂情真意切，令人難忘。

除北京之外，在廣州、山東等各地學生都組織了大遊行。在江西九江，學生除罷課之外，還要求商店停業以示對五四的紀念^⑦。全國各地民眾在這樣白色恐怖的環境下舉行如此規模的五四紀念會，不難看出「五四」在人民心中的神聖地位。1920年代廣東國民政府與北洋政府相互對峙，五四紀念活動則成為了國民黨反對北洋軍閥，爭取人民群眾的有力武器。而另一方面，北洋政府對於五四紀念活動則是深為恐懼，視之如同洪水猛獸，因此北京、天津被明令禁止開會遊行^⑧。由於北洋政府的高壓政策，使得五四紀念活動被迫轉移到南京、上海，而這也開啟了紀念活動的新篇章。

1923年的第四屆五四紀念活動中，全國學生總會正式向各地學生聯合會發出快電，議決每年5月4日各地學生聯合會應舉行紀念大會，以誌不忘^⑨。1924年上海舉行的五四紀念會可謂盛況空前，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等三十餘校參加，汪精衛、葉楚傖等國民黨高官也進行了演講^⑩。同時舉行的全國學生會五四紀念會上，胡漢民、瞿秋白等國共兩黨理論工作者也高屋建瓴地闡述了「五四」的偉大意義^⑪。在這些青年學生組織的五四紀念活動中，除了闡述「五四」的過程及意義外，還緊緊把握時代脈搏，體現時代特點，比如在1924年的山東學生五四紀念會上，就鼓勵青年們「應振作精神，與軍閥強敵宣戰，以力爭外交而整頓內政」，同時高呼「收回關稅」、「收回庚子賠款」、「推翻現在奴隸式的教育」、「打倒軍閥」等口號^⑫。這些都體現了當時渴望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時代特徵。

此後的五四紀念活動形式大多相似，主要由學生團體發起，青年群眾廣泛參與，並邀請名人演講。吳稚暉、胡適、李石曾等著名人士都曾經在五四紀念會上慷慨陳詞。但是隨着形勢的變化，「五四」的紀念主題也悄然發生了變化，從外交領域轉向了內政領域，紀念規模也從分散轉向了有序。汪精衛在上海五四紀念會上更是提倡「當由一時感情的衝突，進而為長期有組織有規律的活動」^⑬。正是伴隨着這種轉變，此後各地的紀念會上，逐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紀念儀式，通常分為宣布開會，主席就位，奏樂，向黨國旗總理遺像行三鞠躬禮，恭讀總理遺囑，報告開會宗旨，呼口號，遊行，散會等過程，此外還會大量印刷各類傳單，並出版特刊以示紀念^⑭。另外，借助五四紀念活動而同時舉行其他活動的情況也逐漸增多，比如在1924年的太原五四紀念會上，就將檢查發現的劣質商品付之一炬^⑮。

1927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發動了「四一二」政變，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但此時寧漢尚未合流，因此這一年的五四紀念活動也就成為蔣介石南京政府攻擊汪精衛武漢政府的重要工具。在南京五四紀念會上，葉楚傖攻擊「武漢政府不是中國政府，不是國民政府，直〔只〕是鮑羅廷之政府而已」。蔣介石的演說則明顯體現了南京政府運用國家權力改造「五四」主旨的目的，他認為，「人民欲謀平等自由，必須擁護三民主義，大家加入國民黨，受黨的指導，完成國民革命」^⑯，而這也成為國民黨政府利用國家權力重新塑造「五四」這一文化符號的開端。1928年東北易幟之後，南京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了全國，五四的相關紀念活動也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

1927年，寧漢尚未合流，這一年的五四紀念活動也就成為蔣介石南京政府攻擊汪精衛武漢政府的重要工具。在南京五四紀念會上，蔣介石的演說明顯體現了南京政府運用國家權力改造「五四」主旨的目的。

二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五四紀念活動

寧漢合流後，南京國民政府為了能夠更有力地控制人民，便利用五四紀念活動大肆籠絡人心，利用國家權力向人民群眾，特別是廣大青年灌輸國民黨統治思想，其目的就是通過「五四」這一文化符號來達到箝制人民思想的最終目的。

1929年五四運動十周年紀念時，天津市執行委員會發表的〈為五四運動告全市青年〉中明確指出：「本黨現負領導民眾，領導青年之責，當然責無旁貸，而一般民眾一般青年要確信國民革命是中國民族唯一的出路，而領導國民革命的，唯一的是中國國民黨。」^⑩同日召開紀念活動的國民黨南京市委黨部也告誡青年：「唯有總理的三民主義，始足以領導全國人民達於救國救民的大福利之途，唯有中國國民黨乃為救國救民的唯一領導者，吾人於此要絕對服從中國國民黨，堅決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努力奮鬥。」^⑪而在1930年國民黨中宣部告全國青年書中更是明確指出：「今後之青年，倘決心要做一個國民革命的中堅份子，應堅決的牢記着，唯有三民主義，才是融合中外文化結晶之最高指導原則。唯有奉行三民主義國民革命之本黨，才是救國救民運動的革命領導者，這才是青年自救救民救國的真正面目，才不失青年在國家民族中天然的地位。」^⑫

以上這些史料充分表明，隨着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運用國家權力主導紀念活動，掌握文化話語權，利用各種紀念活動為國民黨服務，進而重新塑造「五四」文化符號，是國民黨政府所舉行的各種紀念活動的根本目的所在。

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以汪精衛、陳公博為首的國民黨改組派以及鄒魯、謝持為首的西山會議派和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反蔣政治派別與軍事集團組成了反蔣大聯合。而同年的五四紀念活動也成為蔣介石政府對抗反蔣同盟的擂台。國民黨中宣部告全國青年書將反蔣同盟喻為「一切破壞國家利益之反動勢力，自軍閥餘孽閻錫山、馮系、桂系，以至改組派等，勾結聯合成為一大反動集團」^⑬，並以此號召全國人民擁護蔣介石政府，對抗反蔣同盟。以反抗軍閥為起始點的五四運動居然成為了標榜軍閥混戰正當性的工具，這不能不說是背離了紀念五四運動的初衷。

與此同時，與日俱增的民族矛盾也為五四紀念活動增添了抗日色彩。由於日本帝國主義釀成1928年5月3日的「濟南慘案」，殘忍屠殺數千中國民眾，而5月9日是「五九國恥」紀念日，加之五四運動目的之一也是抗議日本《二十一條》，因此五月初的三大紀念日全都有抗日雪恥的意蘊，這種意蘊也深刻影響到之後的五四紀念活動。

1928年濟南慘案發生的第二天，也就是這一年的五四紀念活動中，上海市黨部臨時民眾訓練委員會發表告上海青年書，鼓勵「進取心最勇敢的青年，對於日帝國主義者當然要有極壯烈的表示」^⑭；同時為了避免盲目排日，也勸誡青年應該將日本民眾同發動侵略的田中內閣區分開^⑮。此外，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已經上升到主要矛盾，在此基礎上，「五四」也就成為了抗日禦侮的標誌性事件。因此1933年各文化團體所補行的五四紀念活動中，其中一個會議特別指出「五四不僅為一種學生運動，大部分含有抗日之意義」，

隨着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運用國家權力主導紀念活動，掌握文化話語權，利用各種紀念活動為國民黨服務，進而重新塑造「五四」文化符號，是國民黨政府所舉行的各種紀念活動的根本目的所在。

並針對國民黨實行不抵抗政策導致東三省淪陷的教訓，告誡廣大民眾「打抗日救國並非貼標語喊口號就能成功」^②。而這次會議還通過了一個提案，即定5月4日為「中國文化復興運動紀念日」，這可以說是「五四」第一個被命名的紀念日^③。

隨着中日矛盾的加劇，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引起了全國廣大民眾的不滿。特別是青年學生也想利用舉行五四紀念活動的機會遊行示威，但就是給予過「五四」高度評價的國民黨政府此時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禁止舉行各種五四紀念會。連當時在校曆上每年5月4日特別添上放假一天而與他校不同的北大，據學校當局表示，也暫時取消這天例假^④。即便是允許簡單紀念，也要派大量軍警、偵探特務進行嚴密監視。如此高壓政策，與北洋政府統治時期相比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⑤。如此壓制人民的愛國熱情，不僅與五四精神的實質背道而馳，也是廣大民眾始料未及的。

儘管國民黨政府有意淡化「五四」作為時代符號的巨大影響力，但是人民的思想是禁錮不住的，而5月4日也成為了他們表達意願的重要紀念日。這些都表明，5月4日這一天作為青年節已經是人心所向，實至名歸，而五四青年節的正式確定通過也是迫在眉睫了。

三 五四運動紀念新篇章

1939年，也就是五四運動二十周年之際，五四紀念進入了一個新的篇章。就在這一年的3月，當時的陝甘寧邊區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正式規定以5月4日為青年節。毛澤東撰寫了〈五四運動〉一文，徹底為之正名。在這篇文章中，他高度評價了五四運動，認為「二十年前的五四運動，表現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五四運動的成為文化革新運動，不過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種表現形式」^⑥。此外，毛澤東還為五四青年節題詞，「目前中國青年的唯一任務就是打勝日本帝國主義」^⑦。

而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也正式規定每年5月4日為青年節，並以1939年5月4日為首屆青年節^⑧。另外，早在前一年的1938年7月9日，與國民黨關係緊密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武昌正式成立，蔣介石親自擔任三青團團長，也正是在該團的建議下，國民黨才將五四青年節作為法定節日正式確定下來^⑨。從國共兩黨同時規定5月4日為青年節，就可以看出兩黨對於「五四」這一文化符號的關注程度；而從深層次來看，也隱含着對於國家未來，即青年的高度重視。

五四青年節的正式設立，極大鼓舞了廣大青年的抗戰鬥志。某青年團體發表的紀念青年節的宣言中明確表示：「我全市青年在熱烈紀念青年節之今日，謹以血誠，向我敬愛之全國父老宣誓，我全市青年有生之日，皆報國之年，誓以統一之意志集中之力量，聽候政府調遣，領袖命令，為抗建大業，犧牲一切，奮鬥到底。」^⑩另外，在抗戰時期，電慰前方將士，勉勵戰區及淪陷區青年學生，也是五四青年節諸多紀念活動的核心所在^⑪。由於汪精衛叛國投敵，建立偽政權，因此在闡述五四運動之意義時，號召全國民眾打倒漢奸，打倒南京偽組織汪精衛及其走狗也成為重要內容^⑫。

隨着中日矛盾的加劇，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引起了全國廣大民眾的不滿。給予過「五四」高度評價的國民黨政府此時卻禁止舉行各種五四紀念會。如此壓制人民的愛國熱情，不僅與五四精神的實質背道而馳，也是廣大民眾始料未及的。

這一時期對於五四運動的意義，尤其是青年在這場運動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也有一些更加深入、全面的闡述。一篇名為〈五四運動的新檢討〉的文章認為，「從這一天開始，真正顯示了中國青年在革命過程中的不可侮的力量，真正奠定了中國青年運動的歷史地位，而中國青年的政治意識也隨着覺醒，國民輿論的力量也隨着昂揚，中國文化也初次試穿上西洋的新裝。」^④另一篇名為〈五四運動之文化的意義及其評價〉的論文則將五四運動視作中國近代的啟蒙運動^⑤。這些評價都標誌着五四運動的研究取得了新的進展，而五四精神也伴隨着這些研究成果薪火相傳。

四 五四運動紀念主旨的變更

但是好景不長。僅僅四年後，即1943年陰曆三月二十九日，三青團中央團部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以選擇青年節要有其時代性為藉口，將原經中央政府規定的青年節改訂為3月29日，並於1944年3月29日在重慶舉行了第一屆「三二九」青年節紀念活動^⑥，而原先的5月4日則被定為文藝節。究竟應該強調五四運動的文學方面還是青年和政治方面，一直是中國政治爭論的一個論題。在海外歷史學家周策縱看來，對於「五四」的不同闡述，雖然並不意味着共產黨把這個運動僅僅看作是一個青年運動，而國民黨把它僅僅看作是具有文學意義的事件，但是這個插曲的確說明了他們對五四運動意義所持的不同觀點^⑦。

從1944年第一屆青年節設立起，「三二九」這一天紀念活動的主題就逐漸從追思先烈轉移到了控制青年。而將3月29日改為青年節在當時也引起了極大的爭議，其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之前普遍承認的青年節為5月4日，而改為3月29日在許多人看來明顯是為了加強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壓制科學與民主精神，這引起了強烈反抗。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當時的西南聯合大學。1944年5月3日，西南聯大舉行了「捍衛五四精神，發揚五四傳統」的座談會，反對國民黨的行為，吳晗教授等還發表了「五四的任務沒有結束」的演講^⑧。1946年5月4日，在桂林師院與桂林文化界聯誼會等五個團體聯合舉行的五四紀念會上，為了批駁三青團，著名學者譚丕模發表文章，重申「五四」是青年的節日，這就支持了具進步思想的同學，打擊了反動勢力^⑨。而當年五四運動的領導者之一羅家倫對更改青年節日期也是極為憤怒，甚至曾在國民黨中央辦的刊物上痛罵這件事^⑩。

儘管五四運動失去了法定青年節的頭銜，但在全國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心中，仍然將「五四」視作屬於自己的節日，因此幾乎每年5月4日，全國各地的大專院校都會舉行各種各樣紀念青年節的活動，從以下不完全的統計表格(表1)可見一斑。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被國民黨政府命名的五四文藝節，基本上沒有甚麼影響力。每年的文藝節僅僅是局限於文化界一些作家的茶話會^⑪。而伴隨着國民黨獨裁統治的加劇，本身用來粉飾門面的文藝節也成為文化界攻擊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武器。1947年，在第三屆文藝節紀念會上，面對着內戰所造成的民不聊生的局面，有良知的作家向國民黨政府進言：「多給自由，少加統制。讓作家們得自由學習，自由創作，自由發表，自由結社。」^⑫但此時的國民黨政府根本不

國民黨將3月29日改為青年節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的爭議，主要原因是之前普遍承認的青年節為5月4日，而改為3月29日在許多人看來明顯是為了加強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壓制科學與民主精神。

表1 1946-1948年全國各地五四運動主要紀念活動一覽^{④3}

時間	地點	舉辦單位	主要活動
1946.5.4	上海市	文協	舉行文藝會，有演講、音樂、舞蹈、戲劇等文藝節目
1946.5.4	北京市	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 北平市政府	沙灘紅樓北大校友聚餐；太和殿舉行紀念儀式
1947.5.1-5.7	北京市	北京大學 燕京大學 清華大學	舉行文藝晚會、科學晚會、詩歌晚會、歷史學晚會、營火會、「五四史料展覽會」、音樂晚會、戲劇晚會
1947.5.4	上海市	上海市青年館	舉辦火炬接力賽跑
1947.5.4	天津市	南開大學 北洋大學 女師學院 天津市學生團體 愛國聯合會	舉行春運會、詩晚會、歌曲表演、籃球賽、划船比賽、排球賽、集體合唱《黃河大合唱》、公演話劇《凱旋》、藝術展覽會、論文競賽、音樂晚會、國術表演、電影
1948.5.3	天津市	南開大學	升民主旗、掛科學匾
1948.5.4	北京市	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	學生自治會發起中午聯餐、舉行「新文化晚會」、詩劇《女人之路》、歌舞劇《車夫之路》及農作舞等節目
1948.5.4	南京市	各校學生聯合舉行	有關五四的史料和木刻漫畫展覽，舉行自然科學座談會、營火會；大會發表紀念五四保障人權，保障教育，搶救民族危機宣言

可能聽進這些作家的意見。在這種壓抑的環境下，五四文藝節也成為了擺設，這不能不說是「五四」這一光榮稱號的悲哀。

隨着內戰的爆發，國民黨所規定的「三二九」青年節也就成為了國民黨維護獨裁統治的工具。國民黨的倒行逆施必然引起人民的激烈反抗，青年學生利用五四運動紀念日與其針鋒相對。在1947年南京市的五四紀念會上，與會的三千多名學生更是喊出了「紀念五四，反對內戰」、「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反對政府非法逮捕人民」等口號^{④4}。恰恰相反的是，國民黨官方制訂的「三二九」青年節則成為了人民群眾表達對國民黨獨裁統治不滿的日子。在安徽白沙中學的「三二九」青年節紀念會上，學生不顧縣三青團的威脅，唱出了《在太行山上》、《蒙古包》等多首解放區歌曲^{④5}。中共地下黨也利用南京各大專院校的「三二九」紀念會，掀起一個「爭生存、爭自由、爭和平」的群眾運動^{④6}。

1948年3月29日可以說是整個民國時期紀念活動的高峰，就在這一天，先烈紀念日、青年節、行憲國民大會同時舉行。行憲國大開幕主席致詞中指出，「實有繼往開來，承繼光榮革命歷史，締造青年之新中國深厚意義。」^{④7}但是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均拒絕出席此次國大，所謂的「制憲國大」成為了國民黨一黨獨裁的偽國大，而這必然會遭到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北京大學成為反抗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旗幟，因而遭到了反動當局的鎮壓。

3月29日，北平警備司令部的查禁令便是向華北學聯開刀的信號。在公布查禁令的當天下午，北京大學許德珩、袁翰青、樊弘，燕京大學張東蓀，清華大

國民黨的倒行逆施引起人民的激烈反抗，青年學生利用五四運動紀念日與其針鋒相對。而國民黨官方制訂的「三二九」青年節則成為了人民群眾表達對國民黨獨裁統治不滿的日子。

學張奚若、吳晗等在北大民主廣場紀念黃花崗先烈大會上舉行了反對偽國大講演。許德珩發表了題為〈黃花崗起義與中國的社會政治〉的演講，並在演講最後鼓勵「今天新中國的青年，要學習黃花崗烈士的精神，全力全心為中國的苦難大眾獻身，不要自豪，不要徬徨在中空。今天我們不怕被人叫做『匪』，叫做『盜』，不怕一切無恥的污蔑，勇往直前，才對得起先烈」^⑩。

此外，1949年春，甘肅省主席郭寄嶠為了解決內戰軍費開支，維護其統治機器運轉，非法發行了大量公債，直接導致了「三二九」示威大遊行，而這也對不久之後蘭州的解放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⑪。

正是由於國民黨的倒行逆施，短短一年之後，國民黨統治便被推翻。而對五四運動的紀念在經過了三十年的沉浮起落之後，1949年12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正式規定每年5月4日作為「中國青年節」，五四青年節終於得以實至名歸。

從1919年5月4日爆發五四運動到1949年12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5月4日正式定為青年節，前後經歷了整整三十年。隨着時代的變遷，各個階段的五四紀念活動也呈現出了不同的時代特點，五四紀念活動可謂一波三折。從這些曲折的過程中，我們既可以感受到風雲變幻的時代特徵，更可以感受到國家權力對「五四」這一文化符號的反覆塑造，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民也正是在五四精神的指引下奮勇前進，生生不息。

隨着時代的變遷，各個階段的五四紀念活動也呈現出了不同的時代特點。從這些曲折的過程中，既可以感受到風雲變幻的時代特徵，更可以感受到國家權力對「五四」這一文化符號的反覆塑造。

註釋

- ①② 〈五四紀念之名人論文〉，《大公報》（長沙），1920年5月8日。
- ③ 〈五四紀念日敬告青年〉，《申報》，1920年5月4日。
- ④ 北京電，《申報》，1920年5月5日。
- ⑤ 〈北京通信：記北大五四周年紀念會〉，《申報》，1920年5月8日。
- ⑥ 〈北京通信——北京之五四紀念會〉，《申報》，1920年5月7日。
- ⑦ 〈九江各界之五四紀念〉，《申報》，1920年5月8日。
- ⑧ 〈五四紀念〉，《大公報》（天津），1928年5月4日；〈京各校自五一至五九禁止開會〉，《申報》，1927年5月8日。
- ⑨ 〈學生會為五四紀念之通電〉，《申報》，1923年5月4日。
- ⑩⑬ 〈上海學生會之五四紀念〉，《申報》，1924年5月5日。
- ⑪ 〈全國學生會五四紀念會〉，《申報》，1924年5月5日。
- ⑫ 〈魯學生之五四紀念〉，《申報》，1924年5月6日。
- ⑭ 從當時的許多新聞報導、檔案資料都可以發現紀念儀式的全過程，儘管不盡相同，但大同小異，基本沿襲了這一流程。
- ⑮ 〈各省教育界雜訊〉，《申報》，1924年5月8日。
- ⑯ 〈南京之五四紀念〉，《申報》，1927年5月8日。
- ⑰ 〈市執委會發表為五四運動告全市青年〉，《大公報》（天津），1929年5月4日。
- ⑱ 〈京市黨部宣傳部為五四運動紀念告青年〉，《中央日報》，1929年5月4日。
- ⑲⑳ 〈中宣部告全國青年〉，《申報》，1930年5月1日。
- ㉑ 〈今日五四紀念〉，《申報》，1928年5月4日。
- ㉒ 〈上海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臨時民訓委會為「五四」紀念告上海青年〉，《中央日報》，1928年5月4日。
- ㉓㉔ 〈昨日各文化團體補行五四紀念〉，《申報》，1933年5月6日。
- ㉕ 〈北大舉行「五四」十七周年紀念會〉，《申報》，1936年5月13日。

- ⑳ 具體情況可以參見〈北大舉行「五四」十七周年紀念會〉；〈五四學生運動紀念平各校開紀念大會〉，《申報》，1937年5月5日；〈五四紀念〉，《中央日報》，1935年5月5日等報導。華北局勢緊張之後，北京、天津的五四紀念活動均被國民黨當局嚴格限制，在如此高壓政策下，各校學生也極為沉靜，呈萬馬齊喑的局面。
- ㉑ 毛澤東：〈五四運動〉，載《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頁522。
- ㉒ 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八十年珍貴檔案》，下冊（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1），頁500。
- ㉓ 梁道群編著：《中華民國紀念節日要覽》（台北：華僑文化出版社，1960），頁48；林美容：《中華民國現行紀念日及節日緣由與意義之研究》（台北：內政部民政司委託計劃報告，1996），頁5。
- ㉔ 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1938-1949）》（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8），頁2。
- ㉕ 〈青年團體發表宣言紀念青年節〉，《申報》，1939年5月4日。
- ㉖ 〈陪都各界舉行「五四」紀念大會〉，《申報》，1941年5月5日。
- ㉗ 〈羅家倫播講〉，《中央日報》，1940年5月5日。
- ㉘ 〈五四運動的新檢討〉，《大公報》（天津），1941年5月4日。
- ㉙ 〈五四運動之文化的意義及其評價〉，《大公報》（天津），1942年5月3日。
- ㉚ 佟建寅主編：《台灣歷史辭典》（北京：群眾出版社，1990），頁143。
- ㉛ 周策縱著，周子平等譯：《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頁3-4。
- ㉜ 楊壽川主編：《雲南特色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850。
- ㉝ 魏華齡、王玉梅主編：《桂林文史資料》，第三十七輯，〈人物專輯〉（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頁252-53。
- ㉞ 轉引自〈過來人談五四：訪周炳琳錢端升兩教授〉，《大公報》（天津），1947年5月3日。
- ㉟ 〈今日第一屆文藝節〉，《大公報》（天津），1945年5月4日；〈紀念文藝節公告〉，《大公報》（天津），1945年5月5日。
- ㊱ 〈文藝節感言〉，《大公報》（天津），1947年5月4日。
- ㊲ 〈今日五四運動節各界舉行紀念會〉，《申報》，1946年5月4日；〈平各界紀念五四〉，《申報》，1946年5月5日；〈北大定五四為返校節，今起盛大慶祝一星期〉，《申報》，1947年4月30日；〈紀念五四運動，今晚火炬賽跑〉，《申報》，1947年5月4日；〈京平津紀念「五四」〉，《申報》，1947年5月5日；〈紀念五四運動〉，《申報》，1948年5月4日；〈各地學生熱烈紀念〉，《申報》，1948年5月5日；〈今日五四北平學生開會紀念〉，《大公報》（天津），1946年5月4日；〈紀念五四〉，《大公報》（天津），1946年5月5日；〈北大舉行「五四周」〉，《大公報》（天津），1947年5月2日；〈紀念「五四」〉，《大公報》（天津），1947年5月2日；〈各校學生慶祝五四〉，《大公報》（天津），1947年5月4日；〈平學生界紀念五四，情緒熱烈如火如荼〉，《大公報》（天津），1947年5月5日；〈南大紀念「五四」〉，《大公報》（天津），1948年5月3日；〈京紀念五四〉，《大公報》（天津），1948年5月5日。
- ㊳ 〈首都紀念五四——三千學生高呼反對內戰〉，《大公報》（天津），1947年5月5日。
- ㊴ 何鵬編著：《何鵬文史論集》（合肥：安徽省地方志辦公室，1996），頁597-98；安慶文史資料編輯部編：《安慶文史資料》，第二十八輯，〈教育史料專輯〉（安慶：政協安慶市委文史資料委員會，2000），頁82。
- ㊵ 周侗編著：《校園風雲錄》（重慶：重慶出版社，1985），頁373-74。
- ㊶ 〈行憲國大開幕，主席主持並致詞〉，《中央日報》，1948年3月29日。
- ㊷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主編：《九三學社》（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頁27。
- ㊸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甘肅省民勤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五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頁173。